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孙景宇

摘要:在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识形成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对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形成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对冷战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使社会主义在适应20世纪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认识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21世纪世界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新境界。

关键词:世界历史;中国革命;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10-0001-09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不仅为认识世界历史的形成、特征、本质和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武器,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为人们能动地选择历史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新的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先后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思想。一方面,为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另一方面,在不断深化认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

展,为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做出了原创性、时代性贡献。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践行和创新发展,有助于从一以贯之的视角理解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关联,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为推动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发展脉络

如果说寻求人类解放的道路是马克思一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则贯穿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始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集中阐释了世界历史的形成逻辑、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动力机制和发展趋势。在《资本论》这部马克思倾注了

收稿日期:2022-08-22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研究”(20JD710025)。

作者简介:孙景宇,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大量时间和心血创作的鸿篇巨著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运动规律,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趋势。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晚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视野从西欧社会转向东方社会,对俄国、印度和中国都做了研究,并进一步扩展到美国乃至世界通史,更为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社会的继承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突破了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40-541}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做进一步阐释。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世界历史形成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交往形式要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水平决定了人们普遍交往的程度,而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又决定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历史上,只有当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将原来孤立的各个民族和国家逐渐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人类历史才成为世界历史。但是,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代表着最积极、最进步的力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终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使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所以,虽然世界历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但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却不属于资本主义。

第二,随着不同国家和民族因世界交往而形成普遍联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就不一定表现为孤立的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直接对应,而是可能通过交往这一能动选择的形式,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与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对应起来。这样对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或不同生产关系发展程度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它们之间的差距就不再是不同时代之间的差距,因世界交往而形成的互相依赖赋予先进的一方和落后的一方以同一时代性,所以,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

特点,还要受到世界发展潮流的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和中期都非常关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前景在于交往的扩大使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538-539}。1874年至1875年初,马克思在阅读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所作的批判性摘要中还强调:“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2]404}但在此之后,随着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起义、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思考日益深入,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逐渐从抽象走向具体,并对世界交往的能动性和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指出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虽然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也正因为世界交往,使东方的落后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同一时代性,因而存在着东方的落后国家“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571}。马克思认为发生社会革命的具体条件,一是资本主义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二是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3]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之后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变化,指出随着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的和垄断的资本,世界已经被少数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将进一步扩大和激化。相应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条件也日益成熟,因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列宁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所带来的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还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着争夺资源、市场和殖民地所展开的斗争,从而深刻地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将“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

国家内获得胜利”^{[4]554}。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划时代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之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列宁在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提到了一个观点,即能够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并不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会带动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开展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并且,在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走法或表现出多样性,“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777}。但是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在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之后,究竟应当如何践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基本原则,同时把这种“多样性”有效地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细节当中,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共存和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列宁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为充分的讨论,列宁之后的苏联共产党反而把世界革命规范为一条道路和一个中心,这最终导致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严重挫折,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反思和检讨。

二、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的 三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深刻分析和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 20 世纪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都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识形成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是“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5]。斯大林认为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就在于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汇集到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6]。那么,这股反帝国主义巨流的特征和性质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力量怎样在这股巨流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科学分析,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伟大时代,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思想的内涵。

第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新时代,最主要的变化是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从而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有了同盟军。一方面,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愿意“为了辅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7]667}。因此,十月革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面旗帜。在此之后,世界革命的性质不再是旧的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而是新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在十月革命之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只要反对帝国主义,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7]671}。

第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包括会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8]303}。之所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近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像封建主义的压迫、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先进分子为实现国家复兴而对革命真理的追求等。因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9]1471}。二是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

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环境,这决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7]681}。三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资产阶级不能完全断绝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联系,从而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所以,中国革命只有在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应当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2. 对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形成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大大拓宽了由十月革命开辟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道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9]1357-1358}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国际秩序建构、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概括,对社会主义中国确立与世界交往的理念、原则、定位、战略乃至话语体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的力量被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加强。针对当时世界局势的特征,英国的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苏联的日丹诺夫提出了“两个阵营”概念^[10]。与之相比,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在苏联和美国之外,还存在着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股力量来自美国和苏联的“中间地带”,包括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9]1193}。这是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新界说,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找到了最主要的国际力量。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东欧各国则发生了反对苏联控制

的问题”^{[11]344}。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丰富了其“中间地带”思想,把中间地带国家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两部分:第一个中间地带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包括欧洲国家、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国家、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1]344-345}。这就为中国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方面能够团结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从而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奠定了认识基础,也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12]。

20 世纪 70 年代,美苏争霸加剧了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分化和改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它们两个超级大国都妄图称霸世界,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第二世界是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还保持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但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因而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它们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①。

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看待世界历史的视角已经不再局限于“两个阵营”格局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是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基本理念和核心主题,在此基础上重构理解世界格局的分析框架,重新认识不同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内在的深刻含义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这是从“中间地带”思想到“三个世界划分”思想都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观点。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通过苏联霸权和支配地位建立

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等级秩序,其实质在于把世界革命规范为一条道路和一个中心,这不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独立自主,“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13]。相应地,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强调中国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永远不称霸,也确立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基本遵循,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时代,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除斗争之外,也可以做到和平共处,这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并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推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重新规范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为把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话语体系基础。

3.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思想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的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起主导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主要问题和任务的基本共识和思想范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进入多极化格局之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潮流的审视和思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开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的新局面奠定了认识基础。

“和平与发展”最初是邓小平作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提出来的。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问题。”^[14]¹⁰⁵对此,邓小平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14]⁵⁶,因而不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不敢打,第二世界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三世界的国家也都反对战争^[14]¹²⁷。二是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14]²³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14]²⁵⁰。

20世纪90年代,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开始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20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紧张和对峙态势的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趋向缓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为主要标志的高科技革命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全球和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15]。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基本共识。进入21世纪,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16]即使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仍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17]⁴⁵。

当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并不意味着这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不仅原来被美苏对抗掩盖下的一些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和领土争端可能会诱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且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18]。另外,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它们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这一点是一致的。因而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与西方大国必然是不同的,既需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9],也需要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17]⁹。

三、理解和适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

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演变,对冷战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贯穿了一条共同的核心主线,那就是理解和适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用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对力量,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理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又是建立在世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应当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通过考察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来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从殖民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原来孤立封闭的自我发展状态,把它们裹挟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落后国家是以特殊的形式经历着资本主义的时代,并且主要地不是获得“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575},而是“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464}。当“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4]651}之后,落后国家成为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不仅存在着本国内部的各种矛盾,而且世界体系中的各种矛盾也渗透到落后国家内部,与其国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群众承受着全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苦难,具有摆脱自身境况的强烈愿望,他们一旦觉醒,就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落后国家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也使得利用这些矛盾来为社会变革开辟道路成为可能。这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因而对处于其薄弱环节的国家来说,当帝国主义的压迫使社会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

上层也“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4]460}的时候,就可能为社会革命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落后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时指出,之所以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长期存在,原因就在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8]49}。

在“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下,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的过程中生存发展,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相应地,反对共同敌人、追求共同利益就成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交往中发挥能动性作用的一个基本策略。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0],更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21],就是因为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问题上,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具有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创造性地把列宁的这一主张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个共同敌人问题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共同利益,可以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具有共同利益,可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反对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问题上,可以利用它们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8]253}。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反对共同敌人、追求共同利益这一基本策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交往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所针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问题上,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二世界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思想所针对的是冷战结束之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敌人,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个问题

上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共同利益。

在“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下,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归根结底还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不等于在经济基础方面已经解决了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对此,列宁曾不无感慨地说:“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22]为了使社会制度能够最终巩固下来,还需要建立起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经济基础,从而找到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要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而是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更合理的方式取得资本主义已经实现的积极成果,同时规避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消极成果,创造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的更好成果。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历史特点和世界发展潮流,同时积极学习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使之转变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在这方面,苏联既没有处理好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交往,也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往。苏联在政治上搞霸权主义,在经济上构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其实质都是封闭对抗,不利于社会主义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也不利于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则在深刻理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本质和特点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理念,提出并践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这一方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局面,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从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苏东剧变”之后挽救和振兴了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也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确立与过渡时代相适应的世界交往的

基本准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新境界

进入 21 世纪,人类“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3]⁶⁶,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虽然“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7]⁴⁴⁴。一方面,资本主义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性,不但原来的和平赤字、发展鸿沟没有解决,还引发了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戛然而止,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资本主义开始从攻势转向守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2008 年开始就下降到 50% 以下^[2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衰落。这说明,资本主义已经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人类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与世界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应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为解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路提出的重要思想理念;是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具体体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呼吁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一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就是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二是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就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是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就是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五是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作为共同利益,真正超越了国家利益、集团或联盟利益,从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在最大限度上为人类进步事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说,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有“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只有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才能把握和塑造人类共同未来^[25]。这就为 21 世纪的世界交往确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彻底摒弃了冲突对抗、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方式,树立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第二,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把 21 世纪的世界交往建立在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塑造了世界市场,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但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及由其决定的发展的不平衡性扩散到世界范围,引发了冲突、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23]⁴⁷⁸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人类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3]⁵³⁸,各国

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不能再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封闭对抗、剥削掠夺的基础上,而是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开展世界交往。

第三,强调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把文明多样性和世界各国差异转化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对于不同文明间的关系,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占据主流的观点是“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与之不同的是,习近平强调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不同文明之间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3]⁵⁴⁴。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是 21 世纪的重要时代特征,正在从根本上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处空间和格局^[26]。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主要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和控制下的世界格局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过程中探索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的。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确立了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使社会主义最终找到了适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方式,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事业。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最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引领时代的高度对世界大变局进行建构性阐释,以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为切入点,以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构筑 21 世纪世界交往的经济基础,以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交往的能动性作用,为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17]⁴⁶⁰的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从 20 世纪的适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方式,到 21 世纪的引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方式,“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7]⁸,也意味着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内在地统一于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

的历史进程中^[23]⁶⁶;既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又放眼于不断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从而为世界大变局开新局,顺应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心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新境界。

注释

①“三个世界划分”思想是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邓小平在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对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349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9.
 [4]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8.
 [6] 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J].中共党史研究,2013(12):82-90.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 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35-57.
 [13]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2.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1.
 [16]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49.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
 [19]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8.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21]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6.
 [22]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0.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April>.
 [25]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7(2).
 [26] 柴尚金.世界大变局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关系重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0):141-150.

The CPC's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Marxist Ideas on World History

Sun Jingyu

Abstract: After the world history entered the era of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sisted on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used Marxist positions, views and methods to observe, interpret and lead the times,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deas on world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formed the idea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 a part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pattern after World War II formed the idea of "the middle zon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trend after the Cold War formed the ide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ese thoughts have endowed Marxism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of China, and made socialism develop and grow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world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ed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se thoughts have contributed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programs to leading world excha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Marxist world history thoughts.

Key words: world history; Chinese revolution; middle zone; three worlds;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责任编辑:思 齐